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初稿)

下册

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

一九七三年七月

目 录

第五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一九五七)……………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
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 的伟大胜利……………	(1)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 的主要矛盾……………	(5)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8)
第二节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而斗争》的发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 运动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的恢复……	(12)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 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	(12)
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	(13)
镇压反革命运动……………	(16)
抗美援朝运动……………	(18)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	(2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运动……………	(31)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37)
第三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粉碎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39)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刘少奇“巩固	
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纲领的破产……………	(39)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粉碎……………	(47)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	
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	(52)
第四节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	
改造的基本完成……………	(55)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55)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59)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肃清反革命分子	
的斗争……………	(62)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	(66)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本完成……………	(71)
本章小结……………	(79)

第六章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一九六二) ……………(83)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发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
伟大胜利……………(83)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83)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8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著作的发表……………(91)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98)

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的斗争……………(10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107)

第二节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109)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党的建设

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109)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114)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17)

纠正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错误。农村

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121)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

被粉碎……………(125)

第三节 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战胜	
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	(130)
粉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13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	(139)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140)
农村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	(143)
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斗争.....	(147)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51)
本章小结	(158)

第五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一九五七)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
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完结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并不是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地方着手施行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如白崇禧、胡宗南等部，仍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那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也需要恢复和发展。为了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党必须首先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

各级地方政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十七日解放了闽东南战略要地厦门。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九、十月间的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主力一部。接着，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在广西边境歼灭了白崇禧残部。第二野战军主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以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从十一月初起分路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第一野战军主力和华北解放军一部，于十月二十日进驻乌鲁木齐，并陆续进驻新疆各地。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又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总计，我军在建国后一年的英勇作战中，共歼敌二百零三个整师，约二百十八万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和许多沿海岛屿。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又剿灭了土匪数十万人。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实行军事管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事机关组织各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各地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肃清土匪特务，恢复生产。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建立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认为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动员群众协助政府完成各项革命工作的有效办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

府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号召各地必须在一年内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一九五〇年七月，一些省、行政区和各大城市以及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联系，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任何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构，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控制外汇管理。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着手从各方面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影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在建国以后的一年内，我国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英国、挪威、荷兰、芬兰等国进行了建交谈判。此外，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访问苏联，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举行了会谈。一九五

○年一月，周恩来总理也到达苏联，参加谈判工作。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使亚欧大陆上的近七亿伟大的人民结成了亲密同盟。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这个条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保证。

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决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惨败。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蒋介石反动派盘据着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顽固地庇护蒋介石集团，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积极重新武装日本，觊觎朝鲜，妄图武装侵略中国。它支持蒋介石残匪派遣特务间谍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武装封锁我海港，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南沿海城市。它还对我实行“禁运”，妄图在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它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新中国内部“再显身手”，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人民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这一切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与此同时，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印度尼赫鲁政府，还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阴谋把我国领土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用作侵略新中国的大陆基地。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就策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发动了“驱汉事件”^①。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南各省，准备向西藏进军时，美帝国主义又放出西藏地方当局将派出“亲善使团”赴各国的空气，暴露了他们策动分裂活动的野心，当即遭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驳斥。^②全国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面准备进军西藏，一面希望西藏地方当局采取正确态度，实现

西藏的和平解放。但帝国主义者对西藏地方当局威胁利诱，用各种方法阻挠他们派代表团前来谈判。为了确保祖国的统一和西南国防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解放昌都地区的中心城市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孔道。这时，正是侵朝美军疯狂地向我东北边境进犯的时候，印度尼赫鲁政府竟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进行威胁，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等等。我国政府当即予以驳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④随着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藏军主力的被歼，终于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决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派出代表团由陆路来北京。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当局代表，也由海路东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同时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指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确定西藏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至此，全国大陆宣告全部解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

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钢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石油产量的百分之百，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百，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机构还垄断了全国纺锭设备的百分之三十八，织布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糖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并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接收了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商店以及其它企事业。到一九四九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达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拥有工人七十五万多人。这样，一方面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以及重工业的主要部分和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重要步骤。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国营经济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从此，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人民政府还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的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中国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由于丧失了过去享有的特权，大

部无法维持，有的申请歇业，有的转让给了我国政府。

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限制其消极作用，并逐步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仍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民族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九四九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为六十八亿余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一九五〇年，全国私营商业商品销售额为一百八十二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一、零售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是在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基础上生长发展的，它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产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对抗的，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在我国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又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过统一战线，现在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

侵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尽可能地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采取团结、批评、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极其深刻的斗争，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了。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建国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占第九位，即以比较发达的棉纺工业而论，棉纱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国民党政府连年不断地发动内战，在最后逃跑时又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严重地摧残了工农业生产。一九四九年的工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只有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棉布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只有十八亿九千万公尺，总计平均减产一半以上。旧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粮食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一九四九年农业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降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棉花降低了将近一半，只有八百八十九万担。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

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由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破坏和长期搜括，堤防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以水灾最为严重。经过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顽强的生产救灾斗争，还有七百万人靠国家救济。城市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失业人数达到四百多万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

国家暂时经济困难，被资产阶级看成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们乘机捣乱金融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资产阶级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和七月，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妄图搞垮无产阶级，夺取市场的领导权。上海刚一解放，资产阶级投机家就以“证券大楼”为中心，仅十天左右时间，就将黑市银元价格哄抬近两倍。黄金、银元、外币的狂涨，引起了整个物价的暴涨。六月十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封闭了“证券大楼”，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余人逮捕法办，并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初步打击了投机商。但到十月中下旬，各大城市资产阶级又相互呼应，大量套购囤积，哄抬物价。华北区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引起全国性的物价涨风。在十一月旬，上海的物价最高时每天暴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日一天中，上海投机商人向国营商业套购的粮食达平时交易额的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断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不得不向他们求援。资产阶级也不可一世，狂妄叫嚣“共产党军事十分，政治八分，经济零分”，似乎市场终究只能由他们占领的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妄想很快地全部破灭了。在党中央

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沈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致行动，用充分的物资准备，迫使各地的物价直线下降，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取得了争夺市场领导权的胜利。

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向人民掩盖困难，这种困难是一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造成的，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是人民政权，完全有办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连续几次战胜资产阶级掀起的物价涨风，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人民预告：“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转引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资产阶级在十一月的挫折之后，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底又一次抢购物资，企图掀起第四次的物价涨风。但是，人民政府早有准备，进一步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稳定物价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场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是建国以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打垮了投机资本，加强了国营经济，为把自由竞争、牟取暴利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造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准备了条件。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独立作战的环境，财经工作采取政策上统一

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办法。建国以后，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以及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但是公粮和税收大多数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而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部分国家支出却依靠增发通货。这种制度已不能适应在全国统一市场管理和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领导的需要，不利于集中力量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因此，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通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避免分散和浪费。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对于平衡收支和稳定物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债。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人民政府。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一九五〇年三月为一百，同年十二月为八十五点四，一九五一年为九十二点四，一九五二年为九十二点六。

国家财经工作的统一和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更加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

第二节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的恢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 为了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到九日，党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毛主席全面地规划了下列各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

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陆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认真地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 error，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对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是我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

六月十四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讨论政府工作，充分发扬民主，把全国人民组织到实现党的纲领的伟大任务中来。

【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战斗纲领的指引下，党首先在新解放区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冬春，在华北各城市近郊等一部分新解放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连老解放区在内，约在一亿六千万总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

口)的地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还有约三亿一千万总人口(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引导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该赞成这种改革”。这个草案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六月三十日,由毛主席亲自下令颁布。广大的新解放区遵照土改法令的指示,根据剿匪反霸等工作进展的情况,逐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打倒地主阶级。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全国已经基本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权保卫和支持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党除了正式发布土地改革法之外,一九五〇年七月又由政务院制定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坚决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地实行“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倾向,反对恩赐观点,充分发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作骨干,团结中农,由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亲手斗倒地主、没收和发配土地,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

水平。

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次土地改革实行了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由于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情况与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时不同了，“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同时，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吸取了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几个月的教训，防止了“左”的干扰。八月，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并对传播经验等问题规定了必要的限制，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城市，因此，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组织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发动城市中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毛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主席的教导，鼓舞了許多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改造。这种城乡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助于农村中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有助于正确执行保护工商业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政策。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主要是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两个冬春），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还未进行土改外，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土改运动过程中，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地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这一切，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约有二百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给了当时危害极大的土匪恶霸以沉重的打击。对蒋介石集团布置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搜捕，并在一些城市开展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但是，还有大批反革命残余力量存在。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保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

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从此开始了。

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情绪成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党内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对敌情缺乏认识，麻痹轻敌，放松了对反革命的警惕。他们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强调了宽大的一面而忽视了镇压的一面，使反革命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一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制裁。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说这是“宽大无边”。加以当时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起来，妄图里应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抢劫暴乱，破坏厂矿交通，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破坏农业生产。一些恶霸地主也乘机跳出来破坏土改，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广大群众深切地感到，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有安定的生产和工作环境。

党中央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和党内的右倾情绪，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毛主席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全面地体现了党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完整的规定。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右倾错误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起，全国范围开展了大

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五一年春形成了高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检举、监督和清查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人民政府能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反革命活动。这次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复辟阴谋，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新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期间，党还结合镇反进行了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早在一九五〇年初，有的工厂企业就开始了废止封建把头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把工矿企业的民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一场包括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复杂的斗争。党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首先在国营企业，然后在私营企业中，有领导、有步骤、有系统地清理了反革命分子，并对企业中压迫工人阶级的旧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通过这个运动，打击了工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抗美援朝运动】正当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步侵略朝鲜并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便处心积虑要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妄想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它极力扶植逃到台湾省负隅顽抗的蒋介石小朝廷，同时，在北翼武装南朝鲜反革命军队，在南翼干涉越南，妄图从三路进攻中国。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指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李承晚傀儡集团的进攻，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英勇反击。二十七日，美帝派出海空军援助南朝鲜侵略军。美帝头子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朝鲜战争，实行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破坏世界和平，同时，又悍然宣布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公然侵占了我神圣领土台湾省。美帝点燃起的战火已烧到我们的大门前了。毛主席在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已经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协议，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并不是中、朝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它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一意孤行，竭力扩大侵略。七月七日，它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统率侵朝干涉军。此后，美帝即纠集十五个仆从国家派出军队，打起联合国旗号，扩大侵略战争。八月下旬，美国侵朝军飞机公然侵入我东北上空，在鸭绿江右岸进行扫射。九月十五日，美侵略军大举在仁川登陆。三十日，侵占汉城，扩大侵略的野心更加明显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就向美国发出警告，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

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④十月二日，美帝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二十一日侵占平壤，并向沿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我国边境疯狂进攻。同时，美帝空军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进行轰炸和扫射。美帝国主义狂妄地叫嚣：“在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⑤，公开表示要进犯中国。中国人民和美帝侵略军的一场武装斗争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对于美国侵略者挑起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表现了严重的动摇。资产阶级惧怕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担心我国人民的坚决迎击美帝挑衅的原则立场会“引火烧身”。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被美帝的战争叫嚣所吓倒，反对出兵抗美援朝。他们不仅背叛了中朝人民在长期反帝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友谊，听任美帝侵略邻人而不予援助，而且准备放任美帝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迅速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唇亡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方针，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干扰，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意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总兵

力为六十九万多人，其中美军四十一万人，李承晚军二十四万人，十五个仆从国军队四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规模很大的海、空军部队。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遵循“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奋战。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到一九五一年五月，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月，敌军集中三十万兵力，侵至鸭绿江边，梦想在十一月一日前全线推进到中朝边境，二十三日实现占领全朝鲜的野心。美帝狂妄自大，不顾一切，分兵冒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集结于西线的主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对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在温井西北的两水洞，突然扭住冒进的敌人，迅速予以歼灭。接着，又连续举行攻击，经过十二昼夜的战斗，歼敌一万五千多名，将鸭绿江、图们江一带的美李军驱逐到清川江以南，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役。

十一月二十四日，敌人再次集中精锐部队二十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到清川江以北，使西线敌军伸进了我军布置的战场。我军出敌不意，于二十五日发起反击，围歼了敌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东线的朝中人民军队，从二十七日起，也突然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攻击，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不断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仅仅三天时间，美国侵略者吹嘘的“总攻势”，就一败而为总溃退了。到十二月下旬，朝中人民军队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

了朝鲜战局的形势。

第二次战役之后，敌军妄图利用三八线原有阵地，阻止朝中人民军队前进，以争取时间补充实力，卷土重来。我军乘敌立足未定，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动了新年攻势，在强渡冰冷刺骨的临津江后，迅速突破并割裂了敌人防御地带，解放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引诱我军主力深入南朝鲜，以便从我军的侧后海岸登陆进行夹击。我军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停止了追击，保持了主动权。第三次战役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一月二十五日，敌军二十万人又向朝中部队汉江南岸阵地进犯。开始，我军在汉江南岸进行阻击，并在东线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举行反攻。随后，我军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汉城，全线转入机动防御。到四月二十一日，敌人象爬行一样，只推进了一百多公里，却损失兵力七万八千余人，最后被我阻止在开城——杆城一带。结果，第四次战役也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下令撤掉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等四项职务。

美李军接连遭到四次惨重打击后，又策划在朝中部队侧后海岸登陆。建立所谓“元山——安州一线的朝鲜半岛的新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朝中人民军队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发动了强大的春季反击战。经过五十余天的奋战，在整个战线上将敌军逐退了五十——七十公里，消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胜利地结束了第五次战役。

经过五次攻势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歼

灭了美李军二十三万人，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国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期间，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影响。党教育人民要仇视美帝，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要鄙视美帝，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要蔑视美帝，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与此同时，党还在全国人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签订爱国公约的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大批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针对美帝细菌战的罪行，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这期间，全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互相推动，以更快的步伐把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美帝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的非法行动，针锋相对地管制和清算了美国在中国的公私财产，基本上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同时，人民政府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分别作了处理，肃清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势力，并推动了天主教、基督教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美国侵略者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败局已定。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日益发展。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矛盾正在加剧。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一天天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接受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坐到了谈判桌上来。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

但是，美国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它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另一方面又在战场上拼命反扑。八月间，敌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朝中人民军队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二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志愿军按照毛主席指示，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重新坐下来谈判。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国又一次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并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妄图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要求。敌军的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两公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固守。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了黄继光以身体堵住敌人地堡的火力，打开部队前进道路的英雄事迹。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歼敌二万五千多人，阵地巍然屹立不动。上甘岭成了敌人的“伤心岭”。美帝的军事进攻又以惨败而告终，因而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再次恢复和谈。

为迫使敌人认输罢手，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开始，协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战役初期，我军夺取了敌前沿支撑点，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歼敌四万余人。然后，我军向敌四个师共二十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发动进攻，

一小时内全线突破，歼敌七万八千余人。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的提高。

美帝国主义眼看无法挽救败局，又害怕朝中人民军队继续扩大进攻，终于被迫接受停战。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动员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新式武器，耗费军费二百亿美元以上，结果损失兵员三十九万多人，连同南朝鲜傀儡军和其他帮凶军共损失兵力一百零九万多人，最后还是落得了个可耻的失败。全世界人民在朝中人民的胜利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连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象人家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⑩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全世界人民也站在我们方面。它证明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抗美援朝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只要依靠人民，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使私营工商业固有的弱点逐步暴露了出来。一些过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了市场。物价稳定后，社会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奸商囤积的商品被迫上市，市场上出

现了某些暂时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更造成了公私经济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产销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少资本主义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难于维持，有的歇业，有的停工减产。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必须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〇年六月起，全国开始进行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切实地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方式，使私营工业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并使它们取得一定的合法利润。对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贸易机关在批发和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它们以一定的活动余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利用其积极作用，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流，但绝不允许私商进行投机活动。

在当时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还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必须调整劳资关系。人民政府规定，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了“劳资两利”的原则，一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允许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由国家直接计划，存在着产销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还必须调整产销关系。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专业会议，经过公私代表充分协商，拟定了各行各业的生产计划，以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措施的实行，进一步确立了国

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将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随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有了某些发展，对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取得初步成效时，党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各项运动的伟大胜利，并向全国人民指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逐渐暴露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十一月下旬，在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揭发了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刘、张两人为了满足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大量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罪行十分严重。这个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腐蚀侵袭的严重程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时的祝词中，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月九日，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提出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在党的

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五反”的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较量，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一场很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挑起的。它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即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人员；随着就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即斗资产阶级。党组织了有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五反”工作队，进入私营企业，同本单位群众结合，开展“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揪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经过对资产阶级的揭发，又不断发现了机关团体中贪污和盗窃罪犯的线索。这样，内外夹击，使运动越来越深入。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犯曾企图抗拒运动，组织“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交待罪行，有的甚至用停工、停薪、停伙等手法，对职工进行威胁利诱，妄图蒙混过关，但在强大的群众运动面前，都一一失败了。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把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派进各地甚至中央的经济部门充当坐探，有的资本家竟在国家经济机关建立了一、二百人的坐探网。他们大量偷税漏税，天津、上海偷漏营业税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二和九十九。他们大量盗骗国家财产，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手法偷工减料、骗取高额利润。他们大量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甚至把国家经济情报出卖给帝国主义。有些大奸商还通过把持“同业公会”或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营社”等非法机构，组成垄断集团或盗窃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向无产阶级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有些不法资本家为了攫取暴利，竟然把一穿就裂的胶鞋，一刨就断的铁镐，一铲就卷口的铁锹，卖给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甚者，有的反动资本家竟用已经腐烂的牛肉作成罐头食品，用发霉的面粉作成饼干，在咸菜和大米中掺沙子，用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拣来的棉花作成“急救包”，供应志愿军，造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中毒死亡事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资产阶级的这种“五毒”活动，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在四十五万多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当中，有百分之七十六不同程度地犯有“五毒”罪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解放后刚刚有了某些发展时，就自以为羽翼渐丰，又可以同工人阶级较量了。这是资产阶级反限制、反改造的反动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它说明不经过严重、反复的斗争，要资产阶级自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腐蚀国家机关干部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国家机关中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中，有些人原来就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同资产阶级里应外合，为非作歹。在资产阶级的侵蚀下，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员也严重地滋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恶劣倾向。他们忘记了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的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丢掉了

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少数人甚至被资产阶级的吹捧、行贿和“美人计”等手段拉下水，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蜕化变质，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会被篡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会丧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三反”“五反”运动坚决地彻底地揭发了这些严重现象，把它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

毛主席掌握了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具体地、精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态，及时地提出了党的伟大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各级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分别处理。对于贪污盗窃犯，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赎罪的从宽处理，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于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转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在“五反”目标下，把私人工商户（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但不包括摊贩）划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例如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

孤立。后两类在补交税款、退回赃物之外还酌情给以不同的处分，个别罪行严重的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则处以死刑。这种处理使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受到必要的教育，又使少数严重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处，体现了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处相结合”的方针。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三反”“五反”运动在一九五二年六月进入了结束阶段，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个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并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旧社会的污毒，树立了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通过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开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开展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

我们党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作为基本教材^①，广泛组织在职干部进行学习。各机关、部队、工厂、大中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

委员会，积极进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一九五〇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了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论文《实践论》。一九五一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八篇重要著作。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发表的重要著作，每篇著作都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并由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建国以后，在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事件。

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部影片以清末戊戌变法运动为历史背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歪曲历史，宣扬投靠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颠倒是非地把光绪皇帝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说成是爱国行为，而把人民的反帝斗争污蔑为“杀人放火”。它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侵略和颠覆的需要。这部影片原由一个反动文人编写，在解放前由一家反动电影公司

摄制，以讨好帝国主义并为垂死的蒋家王朝献策，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蒋家王朝覆灭之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已经烧到我国大门的时候，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刘少奇、周扬一伙，竟然还把这部影片说成是“爱国主义”的，为它的上映大开绿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转引自《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在这场深刻的斗争中，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次提出要批判这部影片。然而，当时窃据旧中宣部领导职务的陆定一、周扬等人，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批判。由于江青同志的坚决斗争，刘少奇一伙终于不得不让《清宫秘史》停映。但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却被他们暂时扼杀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根本方针，“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刘少

奇、陆定一、周扬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政策。一九五〇年底，正当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刘少奇、周扬一伙又抛出了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公开上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宣扬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影片。远在解放前，国民党伪中央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摄这部影片，但没有来得及拍完，蒋家王朝就覆灭了。解放后，窃据了上海文艺工作领导职务的夏衍，继承了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拍完了这部影片，并为封建奴才武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为人民服务”的外衣。这部反动影片出笼后，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报纸和刊物，就登载歌颂武训的文章至少有四十多篇。其他如《武训传》的电影小说，歌颂武训的章回小说、画传等也纷纷出笼。这些文章、小说公然鼓吹学习武训和所谓“武训精神”，把武训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象武训那样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取消革命。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评。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深刻地剖析了电影《武训传》的反动性，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

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主席严肃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主席特别提醒全党注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此，毛主席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江青同志亲自带领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深入武训家乡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份重要报告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它以铁的事实证明，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场斗争，给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以迎头痛击，有力地批判了改良主义、奴隶主义和投降主义，直接推动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运动的开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准备。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深刻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九五〇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就向民主党派

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文教单位、民主党派、工商业、宗教界开始了普遍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划清两种思想界限，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清理了知识界的队伍，清除了一小撮隐藏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改革的指示，废除了学校中的反动课程，开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开办了一大批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工农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并且在工厂、农村开展了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此外，还逐步接办了过去受帝国主义津贴的教会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一批据点。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还

进行了院系调整。同解放初期相比，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小学生达五千一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中学生达三百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高等学校学生达十九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二，工农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二千七百万人，扫除文盲六十五万多人。但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极力保护国民党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后来，他们又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已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热烈地开展生产竞赛，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政府在财政尚有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它开支，增加了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因此，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与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超过百分之四十六，铁、煤各超过百分之七，机床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棉纱超过百分之四十八，糖超过百分之九，发电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二。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的产量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分别为：钢八百五十四，煤二百零五，机床八百六十八，棉布二

百零三，糖二百二十七。交通运输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建国三年来，共修复铁路一万多公里，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共整修公路三万二千四百多公里，新建公路一万一千多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新铁路（即一九五六年建成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战线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淮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使几千万农民免除水灾的威胁，保证了广大地区的农业丰收，促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以一九四九年的年产量为一百，粮食：一九五〇年为一百十七，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四十五，棉花：一九五〇年为一百六十，一九五一年为二百三十五，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九十一。畜牧业和渔业也有了显著发展。三年来，大牲畜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羊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渔业产量增加约三倍。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优势有了进一步的生长，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五二年已占百分之五十六。铁路已完全由国家经营。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企业，国营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进出口贸易约有百分之九十已由国家经营。在国内的零售贸易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全部零售额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建国三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战斗纲领，英勇奋斗，终于完成了为争取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光荣任务，为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纲领的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进入以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头三年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紧张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原则上解决了我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

本方针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是很复杂的。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百分之十九点一，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百分之一点五，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为百分之零点七，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百分之六点九，小私有制的个体经济为百分之七十一一点八。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百分之五十六，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其中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五，加工订货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自产自销的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一。在农村，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个体农户则占百分之六十。在手工业中，参加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一，个体手工业者则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九。这就说明，我国社会中不仅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而且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合计起来，在全部国民经济中还没有占到四分之一。在阶级关系方面，那时，我国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被推翻了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正如列宁所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

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严重地存在着。因此，在我国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过渡时期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就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路线，先后对天津市委、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和东亚毛纺厂职工狂热地宣扬“剥削有功”论，说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轻时代”，“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吹捧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五月，他又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几十年以后”，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生产过剩”的程度时才行。刘少奇的这一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再版，是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叛徒陈独秀那里拣来的破烂货。

刘少奇及其一伙鼓吹在城市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东北和华北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又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互助合作运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冬春，东北贫下中农的变工互助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刘少奇根本否认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恶狠狠地咒骂这种发展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将来“势必要缩小”。他主张在东北发展“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叫嚣对雇工“应该放任自流”，“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他指使中央组织部允许党员雇工

“有完全的自由”，说党员不雇工是表示“党员对生产消极”，说什么“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怕”^⑥，阴谋从根本上瓦解我们党。不久，华北地区贫下中农参加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有的地方积极提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合作社的要求。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又背着毛主席，在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硬说什么只有“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⑦极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把他的“理论”和做法归结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抛出了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他到处宣扬要“确保私有财产”，鼓吹“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和租赁自由，放债自由，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也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同样是掩护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完全违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的。

针对刘少奇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又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于三月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在新的条件下农民的两重性，即经过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一方面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肯定农民中的多数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看到一部分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决议规定，在一定时期中并不禁止富农经济的发展，以便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但是决议强调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满腔热诚地支持当时正在东北和华北迅速发展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总结了已有的经验，分析了互助合作组织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即初级形式的主要是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助组，第二种是较高级的常年互助组形式，它已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种分工分业，并有少量公共财产，第三种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指示各地，应根据新老解放区和运动发展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发展方针。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对于个体的农民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决议更加具体地表现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坚持在农业合作化中实行由低级向高级的逐步发展的方针，使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实行互助合作。除了大量的互助

组之外，早在一九五一年，各地便重点试办了四百个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二年底，全国成立了三千六百六十三农业社。一九五三年春，在党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鼓舞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迅速成倍地增长起来，许多互助组积极要求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由个别试办发展到普遍试办阶段。但是就在这时，刘少奇之流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却刮起了一股反对“急躁冒进”的妖风，在一些地方成批地解散农业合作社，强迫把合作社降为互助组。仅河北一个省，共计五千八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被搞垮了两千多个。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镇压下，许多已经办起了的合作社，被迫转入“地下”，实行“明组暗社”。一边是党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决议的发表和贫下中农要求办社的积极性，一边是刘少奇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修正主义面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

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反对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错误的同时，党也注意纠正“左”的倾向。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很快地克服了。

在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了。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分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主席谆谆教导全党，我们在检查工作、批判错误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并且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但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是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宣告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

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

从此，党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群众运动，使毛主席的指示在城乡人民中做到家喻户晓，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向着新的高潮发展。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财经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会议指出推行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号召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党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冒进”口号。毛主席在会上深刻地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转引自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以草案形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来两年的经验，充分肯定了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在试办中充分显示了出来。中央要求各地党委要更好地注意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以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在这个时期，党还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包括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使粮食

购销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实际上实行了对私营粮商的全行业改造。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一举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的主要渠道，大大地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些事实表明，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芒的照耀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粉碎】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和激烈了。一九五三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正在这个时候，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高岗和饶漱石，代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利益，结成反党联盟，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激烈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高岗在一九四五年到东北以后，就拉拢私党，组织反党宗派集团。从一九四九年起，他就开始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诬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谣言。他肆意篡改党史，鼓吹“陕北救中央”、“中央靠陕北”的反党谬论，无耻地抬高自己，妄图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他鼓吹“东北特殊论”，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把东北地区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九五三年高岗调到中央工作之后，更加紧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和另外

两个野心家、政治骗子秘密地勾结在一起，制造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且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高岗还背着党中央向外国去报告消息，里通外国。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阴谋家、骗子手和伪君子。他在一九四三年开始，就多次玩弄阴谋权术，进行夺取个人权力的活动。全国解放后，他用欺上蒙下的手段窃取了华东地区的领导职务，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篡改为“教育、团结、提高”的政策，把党中央提出的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党号召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却要资产阶级搞什么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自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他公然违抗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拒绝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做法，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以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便同高岗结成联盟，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要特点，就是用玩弄阴谋流计的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对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不断变换手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发动进攻。高岗狂妄地宣称，他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他伙同林

彪、背着中央暗中商订新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人选。他们口蜜腹剑，表面上装做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干着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反党活动。他们利用职权，封官许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拉拢死党，为夺取权力做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达到了猖狂的顶点，表面上似乎是反对政治局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企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地识破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领导全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中央向反党分子提出了警告，指出有人搞地下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建议，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四年二月，党中央举行七届中四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首先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团结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基本保证。党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也只有依靠全党的团结，才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无论在什么时候，革命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决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全党同志更要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

党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决议强调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背离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倾向，开展坚决的斗争。根据毛主席的一贯的方针，对于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则必须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决议总结了我党反对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原则，即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关系特

别重大者，应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个党员对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判和斗争。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以粉碎性的打击，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会后，全党在全会精神的教育和指引下，进一步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大量罪行，继续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对于参与高、饶反党活动的一些人，给了他们以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反党联盟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坚持反动立场，对党的批评和斗争置若罔闻，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在大量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指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饶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高岗和饶漱石清除出党，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决议还告诫全党：“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四月四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宣告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彻底垮台。当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并且给了他以严肃的批评。彭德怀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但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隐瞒了他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某些重要事实，蒙混过关。而隐藏得更深的、这个反党联盟的重要头目林彪，则被暂时蒙混了过去。

毛主席领导全党同高、饶反党联盟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激战，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次斗争，我们的党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开始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而积极工作。

自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四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指示》，确定以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为计算标准时间，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以便使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在认真做好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从十二月起，各地陆继普遍开展基层选举运动。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

行第一次会议，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由全体会议组织讨论和修改，并会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定向人民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在人民群众中普遍组织讨论，发动他们积极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六、七月间，全国各地基层单位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月至八月中旬，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分别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普选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普遍提高，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九月九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把修改后的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着，到会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九月二十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它以立法形式固定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集中表达了广大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愿望。它规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个有关国家机构组成的重要法律。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决定周恩来同志为国务院总理。

这次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

第四节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 改造的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战胜刘少奇一九五三年煽起的“反冒进”妖风之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全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为中心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决议发表时，已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一万四千多个。决议要求到一九五四年秋收时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

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但到春耕时就已发展到近十万个。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央决定，到一九五五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十万个发展到六十万个，增加五倍。结果，在当年秋收前已发展到二十二万五千个，年底即增加到四十九万七千个，到一九五五年春耕时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留下了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

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同富农阶级和富裕中农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富农经济自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之后，已被削弱。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党又采取了坚决打击富农的破坏活动和不断限制富农经济等措施，以逐步实现消灭富农经济的目的。

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地进行着。这种改造是通过政治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愿地逐步地组织起生产小组、生产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四年中，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组织的人数已达到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五倍多，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等具体步骤，实行赎买的政策。加工就是国营企业提供原料，委托私营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私营工厂必须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和交货期限完成加工任务，国营企业则按规定付给加工费。订货就是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

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数量进行生产，按期交货，取得货价。统购包销是国家指定国营商业对私营工厂生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按规定条件统一收购，私营工厂不得自行销售，即国营商业通过签订包销合同，规定私营工厂在一定期限内将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一部或全部，按一定规格、质量和协定价格，卖给国营企业包销。代购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购合同，委托私商按规定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向国外或国内订购商品和采购农产品及土特产品，给私商以一定的手续费。代销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销合同，以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店按国营公司牌价出售，并给予一定的手续费。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及代购代销，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公私合营企业，其生产资料由国家 and 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企业的利润按“四马分肥”即按照国家所得税、工人福利基金、企业公积金及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合理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所有这些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式，都是在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五三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范围，加强了对私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在此基础上，国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形式。一九五四年九月，国家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表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这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义企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九，其中公私合营部分已由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二.三，而资本主义工业的自产自销部分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五.三。商业方面，凡是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货源的私营主要行业，基本上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粮、棉、油、煤炭等主要批发行业已转为国营或公私合营，许多零售商业已由经销、代销转变为公私合营。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社会主义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六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九，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零点二增长到百分之五.四，而私营商业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六。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发展，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分的比重显著上升。按照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国营经济已由百分之十九.一增长到百分之二十六.八，合作社经济已由百分之一.五增长到百分之四.八，公私合营经济已由百分之零.七增长到百分之二.一，而资本主义经济则由百分之六.九下降到百分之五.三，个体经济由百分之七十一.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一。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规定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将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

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执行这个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在头两年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事实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自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之后，陆定一、周扬一伙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继续与唯心主义和平共存，让资产阶级权威把持思想阵地，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广泛传播。这是反抗对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它不能不与党的正确路线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到一九五四年秋，这个矛盾终于暴露出来了，发生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搏斗。

事情是由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开始的。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俞平伯，继建国初期重版他三十年前的旧著《红楼梦辨》（出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后，一九五四年又抛出了《红楼梦简论》一书。他完全抽掉《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社会历史

内容，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说《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感叹自己”，是“情场忏悔”，是“色空”观等等。他还引诱青年脱离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去对《红楼梦》进行繁琐的考证。这种曾经统治学术讲坛达三十年之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反动理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在周扬一伙的庇护下广泛地流传开了来。一九五四年九月，有两个青年敢于藐视资产阶级“权威”，冲破阻挠，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篇文章，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这个问题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触及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想代表、旧中国最大的学阀胡适。《红楼梦研究》作者的观点和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它在旧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胡适。胡适派长期以来贩卖的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是人造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真理论，以及庸俗进化论和唯我论的社会历史观。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在旧中国思想界流毒很深，它同国民党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则凭借这种极端的反动的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继续在文化思想界兴风作浪。抓住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就可以进而展开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实用主义的批判。这是中国人民同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搏斗。

但是，这个批判却遭到了旧中宣部、周扬一伙的严重阻挠。江青同志为了推动这场批判，亲自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转载这两个青年的批判文章。然而，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之流却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竟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等为借口，不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而只准在《文艺报》上转载。转载时并且特意加上编者按语，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为了排除修正主义的干扰，扫清展开思想斗争的障碍，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的“某些人”，尖锐地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主席的亲自干预下，周扬之流阻碍批判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玩弄丢车保帅的手法，把事情说成是《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借以保住自己。但是，不管周扬之流玩弄什么花招，一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

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在全国猛烈地开展起来了。不仅胡适派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的流毒受到了一定的清算，而且哲学、政治、历史、教育等领域也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广大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胡适派的主观唯心论的流毒。为了使斗争继续向前发展，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此后，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批判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同时，党中央还领导文化思想界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批判了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和医学方面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工程建筑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思想斗争，对于推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大作用。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正在全国人民开展对胡适派唯心论批判的时候，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长期伪装革命，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实际上却极端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解放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胜利上；解放后，他们潜伏下来，以两面派手法，钻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和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垂死挣扎，频繁地进行秘密活动，并用“上书”的方式开始向党发起了进攻。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向党中央抛出了所谓《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这个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恶毒地把我党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污蔑为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个“意见书”，是胡风集团妄图首先夺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再从这个阵地出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纲领。十一月，当我们党发起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时，胡风以为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文艺界揭发出来的问题，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公开跳了出来。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缺口已打开了”，“问题要全面展开”，满以为可以由此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了。为了粉碎胡风集团的进攻，十二月，党中央决定将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公之于众，向全国人民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让群众辨别是非，展开批判。于是，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就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全国展开了。

批判运动一开始，胡风见势不妙，便抛出了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企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同时，布置他在各地的党羽纷纷抛出假“检讨”，实行退却。但是，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被人民揪住，再也逃不掉了。这时，胡风集团中已有人交出了他们的密信，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窃窃私语”。

从这些黑信中可以充分看出，胡风是怎样指挥他的反动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进攻的；怎样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内来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的。大量的材料证明，胡风及其一伙决不只是什么有错误思想的小宗派，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这些材料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队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或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任务的。这些材料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义愤，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把混在各地的胡风集团的骨干及其党羽，一个个揭发和清查了出来。这个反革命集团迅速地被粉碎了。

毛主席为这些材料写的序言和按语，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给了我们识别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胡风集团有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的策略。他们反对党和人民，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而暗中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当他们的猖狂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赶紧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的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总之，他们以假象欺骗人民，而在暗地里却干着人们意料不到的事情。毛主席提醒全党，“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

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如果说胡风集团给我们一些甚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说明虽然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一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个不小的数量。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又生长了一批新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也不断派特务间谍进来。由于在过去革命大风暴时期，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企业机关又缺乏严格的审查，因而有许多耍两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并且长期暗藏了下来。他们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窃取我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情报，制造破坏事故，进行恐怖暗害活动。他们在农村中制造骚乱和暴动，破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在城市中毁坏机器，纵火烧厂，杀害职工，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动群众，清查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尤其是把那些混进干部

队伍中的坏人清理出来。一九五五年五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一场大规模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便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为这次运动规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七号）。根据这一方针，党在这次肃反斗争中，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弄清事实，正确评定性质，严格分清敌我，“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区别对待，以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指导肃反斗争的专门委员会或专门小组。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肃反斗争，纷纷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配合专政机关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他们陷于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运动经过了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和甄别定案阶段，从一九五五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近二年时间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运动中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制止了一些反革命破坏活动，还破获了许多重大的反革命案件。通过这场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了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广大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更加提高，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大

好。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由以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迅速发展到了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家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发展。但是，革命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企图阻碍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被农业合作化的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对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概看不到。他们胡说合作社办得越多乱子就出得越多，攻击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要我们党“赶快下马”，说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一九五五年五月，右倾机会主义者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召开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不顾党中央在四月间提出的“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的警告，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仅两个多月内，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砍掉了。浙江省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这股右倾机会主义妖风一吹，也影响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稳步不前，不敢发展”的右倾保守错误。有的人埋怨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太快了”，“盲目冒进了”，有的地方甚至动员退社。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使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一时变得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及时煞住了这股妖风。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同年九月和十

二月，毛主席又领导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按语，继续深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胜利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这些著作中，以极大的愤怒谴责了右倾机会主义，深刻分析了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和意义，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号召，

“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少量的富裕农民，而看不到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党有一条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路线，有着领导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又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因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过低估计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经验，这同样也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否定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就必然会滑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

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满足逐年增长的

国家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才能使工业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才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不搞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不能前进。“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就农业本身来说，也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多的农业机械把农业装备起来。如果按照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观点，等工业发展了，使农业机械化了再来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在农村中泛滥起来，以致造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都不能实现。只有先实行农村合作化，才能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支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实现农业本身的机械化。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大机器。这是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这些重要著作中还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他们的经济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们是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老中农中的上中农，即一些经济较富裕的中农，他们的私有观念很浓，具有严重的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才能巩固地团结

他们。总之，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持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中，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如果不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必将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农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将一天一天严重起来，结果少数人发展成为新富农，大多数农民又重新陷于没有土地和贫困的状况。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埋怨我们，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工农联盟显然是不可能继续巩固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叫嚣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制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

要作出关于分期分批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全国的县、区、乡，除作好实现合作化的规划外，还应当作出关于农业、副业、商业、金融、水利、绿化、文教卫生、妇女、青年、整顿党团等项工作的全面规划，并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规划。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各级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

毛主席在这些光辉著作中，还强调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深刻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梁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合作社的制度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巩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指导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学说在当代的新发展。这个报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推动了全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象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了全国。贫下中农兴奋地说：“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亿万农民立刻行动起来，响应毛主

席的伟大号召，热情而有秩序地投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仅一九五五年七月至十月，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六十四万三千个，参加的农户达二千一百二十多万户，均比原有的总数增加一倍以上。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再一次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并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决议发表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十二月底，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又新组织起了六十二万八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有三千七百三十一万九千户。总计，这时全国共有一百九十万零五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七千五百四十五万二千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老解放区各省市已陆续宣布在农村中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落后〉一文按语》）不相信新解放区也能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是错误的。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了一九五六年一月至三月，我国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及时指导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原来预计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工作，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以来不过半年多就基本上完成了。

就在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普遍发展的过程中，较大型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逐渐发展着。这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除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外，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也都归集体所有，废除了土地分红的制度，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它已经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农业了。这种合作社原来已经个别试办。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时，一部分老社合并组成高级社，也有的互助组直接联合组成高级社。毛主席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指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强调指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流，从一九五六年春就发展到普遍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到六月底，入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一百七十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一·九，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有七千六百八十七万四千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这时，不但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参加了合作社，连过去观望、徘徊的富裕中农，也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九月，合作社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又继续进行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毛主席针对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六月三十日又发布命令，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一章程，反映了全国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和愿望，是全面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到十二月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

已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这样，原订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只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五六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达七千万。但是，我国农业经受住了这个严重的考验，获得了大丰收。特别是高级社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初级社高出百分之十到二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就一再指示各地要制定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努力发展生产。一九五六年一月，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转引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纲要》向农民提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绘出了我国农村的幸福明天。《纲要》的中心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纲要》还提出了发展农

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具体任务。《纲要》的公布，把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发出来的劳动热情进一步调动起来了。

五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使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大大上升，资本主义力量大大下降。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向高潮发展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推动下，开始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中，有的行业已经开始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自行交出生产资料的。他们有的表示接受，有的顽固抗拒，多数则是摇摆的。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向他们指出，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同年十一月，党中央召集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代表，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经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这一文件，总结了建国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并根据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到来的新形势，制定了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and 具体措施。党中央决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的阶段。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北京的私营工商业首先被批准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一百十八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全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一九五五年底八万八千多户私营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职工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私营商业中，转为国营、合作和公私合营商店等形式的有一百九十九万户，占原有私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在全国商业总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商业已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现并不是偶然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多数的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勉强交出了企业。少数抗拒改造的资本家，慑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也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没有公开反抗，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工人阶级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坚定地表示，“不管老板如何，我们总是要争取合营”。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切断了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村的联系，城市资本主义更孤立了。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使资产阶级处在工人、农民两头夹攻之中。同时，我们党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即在一定年限内，由国家根据合营以前的资本总额，按照固定息

率（一般为年息五厘）发给股息即“定息”，对原有在在职的私方人员，给予安排，让他们在企业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给他们一张选票，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比抗拒改造更为有利。正是在上述一系列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地指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党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批判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全面规划，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作了准备。从一九五六春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组织起来，并且越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直接组织起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从业人员达六百零三万九千人，占全国手工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七，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全国城乡各地的个体商业——小商小贩，也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底，个体商业除少数随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外，有一百九十五万户参加了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占个体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尚未组织起来的十分分散的那部分个体商业，也在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下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并且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一九五七年的国民收入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九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合作社经济由百分之一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四，公私合营经济由百分之零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七点六，而个体经济则由百分之七十一·八降低到百分之二·八，资本主义经济更由百分之六·九降低到百分之零·一以下。这一切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问题，也还需要继续解决。同时，由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本章小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建国以后，我们党依靠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使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党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

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一场伟大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呼，也遭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更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党中央，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这个大变动中，我国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这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注 释】

① 在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动下，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下令西藏汉族人民和驻藏人员限期撤出西藏。这个“驱汉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九月二日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反动当局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社论郑重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② 一九五〇年一月，美国合众社传出消息，说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要求。美英帝国主义妄图以此为它们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一月二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它们的阴谋痛加驳斥，指出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

③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的答复。

④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新华月报》一九五〇年十月号。

⑤ 引自《美国破坏和侵略我国的阴谋活动》，《新华月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号。

⑥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⑦ 这十二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以及两本通俗读物《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统称“干部必读书”。

⑧ 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⑨ 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第六章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一九六二)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 当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进军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了以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一股逆流。

自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之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一伙，便乘机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鼓吹“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硬说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宣扬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采取和平的、议会的方式来实现，提出了一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会结束时，赫鲁晓夫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在一次会议上抛出了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采取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夸大斯大林同志的缺点错误，对斯大林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会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又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叛卖活动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大肆鼓吹苏联“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宣扬苏联社会已经没有矛盾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宣称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在这种骗人的谬论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着手改变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他们还企图把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在各国党内进行颠覆活动，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是现代修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新的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党在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同时，在党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也总是同国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刚一冒头，毛主席就立即察觉到了这一股逆流，并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领导全党采取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形式，同它作坚决的斗争。一九五六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五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并对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斯大林也犯了某些错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借此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在同米高扬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又当面对他们表示了我党对斯大林问题的严正态度，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转引自《苏共领导网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

其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不秘密，不久就由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叛徒、托派，都兴高采烈，抓住这个题目到处煽动反共。帝国主义者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鼓吹要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混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美共叛徒法斯特之流，公开宣告叛党，积极参加反共大合唱。帝国主义反动派还乘机在东欧一些国家中进行颠覆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反共高潮。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群众闹事事件。波兰群众还进行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本来，只要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赫鲁晓夫却支持这些国家的修正主义分子，乘机篡夺了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匈牙利和波兰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先后实行改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革命分子于是利

用时机，加紧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一批由帝国主义收容豢养的流亡国外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被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同以“裴多非俱乐部”为中心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联合起来，在篡夺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者跃跃欲试，正企图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但是，赫鲁晓夫却被自己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吓慌了手脚。在波兰人民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群众斗争中，赫鲁晓夫集团调动军队，企图实行镇压，而当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他们反而准备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实行投降，企图把匈牙利出卖给反革命分子。在这个十分危急的关头，我们党与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一起，对赫鲁晓夫集团的背叛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波兰问题上，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在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坚决斗争下，苏联政府在十月底正式发表宣言，检查了它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初，又制止了赫鲁晓夫集团对匈牙利的背叛行为，推动苏联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匈牙利人民一起粉碎了反革命暴乱。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击败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

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一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序幕。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首先击退帝国主义煽动的反共浪潮，同时，也由于赫鲁晓夫的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还

十分委婉，并没有公开点名。但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转引自《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这里说的两把“刀子”，指的是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应走的道路。放弃这两把“刀子”，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这个时期我们党对赫鲁晓夫集团进行斗争的理论总结。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精神，又发表了编辑部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指出：“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篇重要文章，对于澄清由赫鲁晓夫的叛卖而造成的思想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进一步亲自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

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但是，党内有些人却看不到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因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而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主席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以后，毛主席把这些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

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毛主席、党中央听取了中央经济、财贸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十个问题，即十个矛盾。第一，关于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必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比重；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重点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沿海工业；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在更大更快地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建设；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不能只顾一头；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要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正确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第九，是非关系，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人，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第十，中国和外国关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报告，用唯物辩证法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及时纠正了盲目学习苏联经验所造成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的矛盾。这个报告的总精神，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它为制定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个重要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候补代表一百零七人，代表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人。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报告的精神指引下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七大”以来我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毛主席提出了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战斗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历史任务，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毛主席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原则，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但是，刘少奇、陈伯达却在会上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紧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在会上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他们乘苏共“二十”大刮起的黑风，别有用心地叫嚷要“反对个人崇拜”，并且在新党章中砍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他们偷运改头换面的唯生产力论，胡说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了大会决议的内容后，当写成文字时，他们又背着毛主席，把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修正主义谬论偷偷地塞进决议案，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毛主席发现这种恶劣手段后，

严厉地斥责了他们，严肃指出这种谬论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通报全党加以纠正。

大会在选举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后，于二十七日宣告闭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发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一九五六年夏秋之间起，由于坏人的挑动和某些官僚主义的存在，我国城市中出现了少数工厂罢工、学校罢课的事件，农村中出现了富裕中农闹社的事件。阶级敌人兴高彩烈，幻想在中国也出现一次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出笼，牛鬼蛇神纷纷登台，魑魅魍魉蠢蠢欲动。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面前，党内斗争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刘少奇一伙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积极支持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一批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跳出来，公开响应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另一方面，许多党的组织不懂得在复杂的矛盾面前因势利导开展斗争，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惟恐天下大乱，希望用简单的压服办法把毒草和牛鬼蛇神压下去。

革命斗争的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究竟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指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理论上武

装全党和全国人民，迎接一场新的阶级大搏斗，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系统地提出和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理论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基本上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相应地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些上层建筑积极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瓦解的作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上层建筑由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变革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这种情况，相适应是其主要的一面。它们之间相矛盾的一面，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是我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以便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在党内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旧的经济基础即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它要竭力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改革，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把社会拉向后退。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成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它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表现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严重的腐蚀和瓦解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掌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地主动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这一斗争，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得特别激烈，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必然力图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刘少奇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的目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在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才特别显现出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虽然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的性质却根本上不同了。在剥削制度下，人民用推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时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调整，使之不断完善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不懂得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就不能正确处理

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一方面，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压迫国内敌对阶级，剥夺阶级敌人的发言权，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另一方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进一步阐明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原理。

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毛主席明确地规定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各种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主席还进一步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指出了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少数人闹事问题、力求使坏事能变成好事的原则。此外，还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关于节约，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科学地、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的这个学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的根本依据。

一九五七年三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召开了有中央和省（市）两级党的宣传文教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并吸收了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却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根据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动向，毛主席指出，我们过去对教条主义作过许多批判，但是往往忽视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

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并向全党提出了注意抓思想问题的任务，强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开展，知识分子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面貌，指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怀疑，但还是爱国的，对我们国家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坚决反对的也占极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则占大多数。总之，“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任务，就是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指出，就世界观说来，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要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便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要认真地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制定了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宏伟纲领，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指针。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毛主席强调“放”的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时，

全党整风即将开始，资产阶级右派正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准备乘机发动猖狂进攻。面对着这一场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大风暴，毛主席强调指出：放出一些毒草和牛鬼蛇神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毒草锄去可以做肥料。香花和毒草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毛主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一定能够辨别真伪，战胜资产阶级的进攻，充满革命豪情地宣告：“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委也召开了党的负责干部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卫生各界党外人士以及民主党派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战线的问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场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遥相呼应，趁我党整风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便在二月至四月之间，四处奔走游说，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毛主席的伟大学说唱对台戏。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后，在刘少奇的鼓励之下，资产阶级右派以为时机已到，公然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反对整风运动指示中提出的采取既

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的原则，叫嚷要“大鸣大放”，妄图整垮中国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结成了“章罗联盟”。他们纠合民主党派和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党的领导是“宗派主义”，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狂叫反对“党天下”，要共产党“下轿”，甚至叫嚷要杀共产党。他们还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声称要成立什么“政治设计院”，实行“轮流坐庄”，妄图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疯狂进行翻案活动，叫喊要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造成了一时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一小撮人利令智昏，以为中间派会跟他们走，可以整垮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只是一小撮，不过占人群中的百分之一、三、五到十，情形不一。但他们是一群具有利牙、喜欢吃人的鲨鱼，现在摇头摆尾地浮到水面上来了。

整风运动中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龙凤龟鳞并长，这是我们党早就预料到的。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党清醒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决定在一个时期中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不予反击。从五月八日起，党的报纸把右派的各种谬论都公开登出来，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清这批丑类，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究竟往何处去呢？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还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呢？这时，他们还是有选择的主动权。在这个期间，我党也曾向他们发出过警告。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作了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号召广大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给党和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郑重警告。但是，正在得意忘形的资产阶级右派对这个告诫根本听不进去。当时被“章罗联盟”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滩头阵地的《文汇报》，竟把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登在几乎使人找不到的地位上。六月六日，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章伯钧召集了一个有北京六个教授参加的紧急会议，密商反革命行动计划。他们如醉如痴，纷纷谈说学生就要上街，只要他们这些“老师”加上去，做“领头的”，天下便会倾刻大乱，他们就要大功告成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当成了绝对劣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终于发展到了顶点。

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我们党内也必然要发生分化。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在紧要关头就会叛变党。这种人平时如鱼沉水底，不容易被察觉，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利用党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向党实行内外夹攻。

物极必反。右派越猖狂，就越快地使人民群众认清他们

的反革命真面目。广大工农兵再也不能容忍了。就在这时，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在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篇重要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军号。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工人阶级纷纷举行座谈会，工人群众踊跃发言，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奋起应战。他们贴出大字报，也来个大鸣大放，同一小撮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右派的罪行。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文献，成为整个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纲领。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系统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这次大会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战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搏斗全面展开了。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中，人民群众用毛主席制定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为指针，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大争大辩，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纲领和反动言行。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这些领域中进行的。通过对右派的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已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右派在全国范

国内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以及“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民盟右派系统，都开始暴露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主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们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在处理上却可以采取宽大的办法。我们把右派当作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要彻底批判，毫不留情，但只要他们不触犯刑律，就可以不办罪，还可以允许有言论自由，有选举权。这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重要文章，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指导反右派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为了指导各地的运动深入发展，七月，毛主席在青岛和各省、市党委书记进行了谈话，分析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毛主席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资产阶级虽然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他们还要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

心的。这个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同时，毛主席又指出，要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分子，把那些混进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去。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规定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建设方向，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指针。

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粉碎后，毛主席、党中央进一步领导了全党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党领导广大农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及其他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关系以及肃反等根本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整社工作。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接着，各级党委在工厂、矿山、交通企业等单位中，放手发动群众揭矛盾，提意见，帮助领导机关整改。党还引导工人、技术

人员和职员，就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为了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正确地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经验。全会决定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会上还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批判了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反冒进”的错误。十月十三日，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对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作了部署。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运动，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庆祝会后，正式开始了为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这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已被击退，赫鲁晓夫集团又加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会上，苏共代表团两次提出宣言草案，硬把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谬论塞进去，企图把它强加给各国党。我党代表团坚决拒绝了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对宣言草案作了多处原则性重大修改之后，提出了修正草案。十一月十日，我党代表团并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明确地阐明了我党对于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在我党提出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中苏两党代表团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十四日至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举行，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宣言》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走这一条道路的九条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民族压迫，反对外来侵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莫斯科宣言》坚持的这些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从

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

《莫斯科宣言》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莫斯科宣言》强调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而“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莫斯科宣言》指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且确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是对苏共“二十大”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修正主义谬论的批判。它向世界人民指明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

《莫斯科宣言》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它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

《莫斯科宣言》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是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决斗争的结果，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还不能把分歧公开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这种条件下，我党代表团为了照顾大局，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作了必要的让步。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世界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深刻地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

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转引自《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重申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主席指出，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中国人民在长期同敌人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一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一系列英明论断，深刻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大大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信心。

《莫斯科宣言》通过后，赫鲁晓夫虽然在纸面上签了字，但是他不仅不改变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而迫不及待地力图推翻宣言的革命原则。从此，维护《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就成了我们党在一个时期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结束了这一场斗争后，毛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一九五七年底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城乡都已确立

了统治地位。革命促进了生产。我国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一百六十七点七，工业总产值为二百二十八点四，农业总产值为一百二十四点七。同五年计划的原订指标相比较，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一一点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一·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五。生产资料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六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四。五年内，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始改变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残缺的状况，建设起能够制造飞机、汽车、新式车床、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的工业部门。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我国已能用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械，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而且工程设计能力也大为提高了，工业布局也开始有了合理的改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战线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包括治理淮河、黄河等巨大的工程，建成了大型水库九座，其中主要的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安徽省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供应大大增加，精耕细作、改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开始推广。在五年内，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逐年有所增长，保证了粮食自给，基本上保证了轻工业原料的自给。到一九五七年，全国有六十六个县、市提前十年或十

一年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粮食指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的面貌，并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这五年的建设工作，还使党和人民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开始找到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第二节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准备了条件。这时，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的任务是：在继续开展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浙江、广西、辽宁、吉林、四川、湖北、上海、广东等省市，深入工厂、农村、矿山和科学研究单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毛主席及时地肯定了整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以此带动各项工作。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布了

《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样，毛主席就把全国人民在整风运动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同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落后现象作斗争，横扫“三风五气”^①，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矩，掀起了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农村中数亿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和春耕生产。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敲响了挖掘潜力的锣鼓，不断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商业部门的职工大胆地打破常规，提出并实现了减少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学校中的师生也开展了勤工俭学和改革教学的运动。全国各条战线，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飞跃的形势。

三月间，毛主席在成都召开了重要会议，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并对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规定地方工业

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根据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提出全国应普遍地积极推广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并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组织和调动起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毛主席热烈地赞扬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有了觉悟的六亿人民，我们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深刻地指出，我国“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介绍一个合作社》是对我国劳动群众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的颂歌，是组织和发动大跃进的号角。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除一千多名代表外，还有一些省市、地委、县委、大城市区委、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和军队负责干部列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是鼓干劲、争上游的大会。

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

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主席教导全党“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信心，自己起来创造。”（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判批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的集中表现，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反映。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只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因此，

实行这条总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工业和农业是两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正确处理工农业以及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工业、农业并举，就是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才能充分发挥五亿多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并使工业在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获得可靠的保证，以加速国家工业化。轻重工业并举，就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轻工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

“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了工农业、轻重工业的发展关系，避免和克服了重

视工业忽视农业、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实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以及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这些方针，批判了贪大求洋的错误，达到了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加速发展新兴工业基地的目的。实行这些方针，就更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便于发掘生产的潜力。

毛主席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解决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一九五八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的局面。

毛主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指明了方向。抓住了粮食和钢铁，就抓住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就能带动工农业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九五八年春的农业生产高潮，带来了夏季的大丰收。它以生动的事实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了农民的思想，驳倒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悲观论调，为争取更大的丰收创造了

条件。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的通知》，号召各级干部在八、九、十三个月内，深入田间，和农民一起搞好试验田、丰产田，抓好田间管理工作。各地党组织还结合生产活动，组织群众辩论，反对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广大农民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向自然要粮，向地球开战”的战斗口号，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日夜奋战在田头。他们积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农业生产的土（改良土壤）、肥（增施肥料）、水（水利灌溉）、种（改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字宪法”，出现了“为了生产大跃进，千万农村都沸腾”的农业生产大高潮，因而在一九五八年秋又获得了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大丰收。

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带来了农田水利、改良土壤、改革农具、改进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广泛开展积肥、造肥、深耕、改良土质运动，并对生产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造和推广了许多新农具，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于全国五亿多农民的努力，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九五八年春的工业生产高潮，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进一步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八月，党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工业生产建设的形势，指出工业生产建设必须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一九五八年钢铁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即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

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办钢铁工业的群众运动。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组织了钢铁大军，有近一亿人战斗在钢铁生产线上。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零八万吨，超额完成了原订的计划指标，即单以近代设备生产的八百万吨算，也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钢铁工业的大跃进，又推动了采矿、煤炭、机械、电力、化工、运输等部门以及基本建设和轻工业的大发展。工业战线上出现了钢铁一马当先，各业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局面。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劳动和技术相结合、技术理论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党以钢为纲大办工业的结果，使工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许多过去不能生产钢铁的省区如内蒙古、河南、甘肃、宁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都能生产钢铁了。由于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工业之花遍及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也举办了几十万个小型工业单位。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中，我国开始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九五八年，我国除了继续建设过去已经开工的将近五百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以外，又新开工建设一千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除钢铁外，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机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新建和扩建了二百二十个大型工厂，而且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工厂。过去根本没有机械工业的专县和区乡，这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办起了机械制造厂和修理厂。总之，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大中小型企业相

结合的、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工业体系正在形成，这就为今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被消灭了。全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大跃进和贫下中农政治觉悟提高的必然产物。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上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已不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组织规模太小，土地少，劳力少，资金少，经营范围狭窄，同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机械化、兴办工业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同时，农村中基层政权和基层生产单位分离的状态，也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领导的需要，出现了农村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高级农业社再向前发展一步，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巩固的需要。

在农村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之前，广大贫下中农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已经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许多构成人民公社的因素已经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初，在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些地方不仅已经组织了突破社界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而且开始实行小社并大社。四月，党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下达后，各地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并社工作的指示，在总结以前试办大社经验和群众已有并社要求的基础上，领导群众展开了小社并大社运动。如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遂平、平舆两县，在四月间，各办了一个六、七千户的大社。五、六月间，两县的小社先后都并成了大社，其他各县也有并大社的行动。至七月底，全区完成了并社工作。这些合并起来的大社，扩大了经营范围，从单一经营发展到兼营其他副业，并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有的地方为了保管和筹划资金，做好农副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销工作，还将手工业社、供销社，信用社归并到农业社中去。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这种新形势，不少地方经过试办，相继进行了社、政合并的工作，实行乡政权同大社管理机构的合一。这样，合并后的大社便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单位，而是包括了工、农、商、学等各个方面，并且起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这些大社就是人民公社的雏型。

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当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地指出，我们的方向是逐步地有次序地组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公社，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八月九日，毛主席表扬了新建的人民公社，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

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指出这是我国五亿多农民继续前进的方向。二十九日，党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阐明了人民公社运动的根源、性质和前途，规定了目前建立人民公社工作中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步骤。九月八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地指出，关于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的号召和党中央的决议传达后，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迅速掀起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群众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积极性，超过了建立高级合作社的时期，纷纷派代表抬着申请书，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全国共成立了八千七百三十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达三千七百七十八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到九月下旬，全国人民公社猛增至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参加的农户达一亿二千一百九十四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至十二月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八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一亿二千三百二十五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八期）大，就是指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比高级社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五千户，比平均每社约一百六十户的高级社大三十倍左右。人民公社经营

的范围和内容也比高级社广泛得多，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公，就是指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加集体化，更加社会主义化，公有化的程度更高。人民公社产生了公社一级所有制，这是高级社所没有的。由于实行政社合一，使公社一级的集体经济开始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成份。

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适应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部分改革而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以及在将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国家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的一种适宜的形式。农村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农村一场深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夺得了秋季农业的丰收，更好地完成了秋播的繁重任务。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组织了劳动力参加采矿、运输、炼铁的劳动，有力地支援了钢铁工业的生产。各地人民公社还举办了小型炼铁厂、发电站、水泥厂、肥料厂、农药厂、农具修配制造厂等社办工业。此外，人民公社还大力发展了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由于生产的飞跃发展，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切表明，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气势磅礴，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农民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

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在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又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会见了工人、农民、干部和学校师生、居民群众。毛主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

“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时地作了指示：“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强调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批判了那种反对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纠正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引起了他们的极端恐慌和拚命反对。在国外，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中国人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积极配合。他们污蔑大跃进是“人

海战术”，“奴隶劳动”，“不切实际”，攻击人民公社是“奴隶制度”，“剥夺了个人自由”，“破坏了家庭”。

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立即反映到了党内来。刘少奇一伙为了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改变了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应当“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把商品、价格、货币一律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反动理论的指导下，刘少奇一伙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他们不顾各生产队在生产、收益等方面的差别，实行穷队富队一律拉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他们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从生产队抽取过多的积累，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大量的劳动力，实质上是无代价的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他们主张国家银行给农村集体经济的贷款一律收回。刘少奇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上述办法来制造混乱，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扼杀新生的人民公社，破坏工农联盟，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主席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随后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并对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措施。十一月二十八

日至十二月十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等决议。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对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决议对于公社的发展方向、生产方针、分配制度，以及对于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规定。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第二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夏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工作。

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高级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因此，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止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

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决议从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出发，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样，决议就进一步阐明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保护和巩固了新生的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决议，是我国建设人民公社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迈进的指路明灯。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结合当前的生产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整社的工作。这次整社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两个过渡”的认识，进一步巩固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度。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党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整社中提出的问题。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

的方针和办法。

在整社中，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区别。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人民公社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通过整社，广大干部和社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贯彻了党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

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指出：“三个多月来的整社工作是良好的，有成绩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会对整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至此，人民公社运动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

当我们党纠正了刘少奇一伙的干扰之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挑起了党内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彭德怀向党进攻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九五八年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彭德怀就怀着没落的反动阶级的阴暗心理，借口“下乡调查”，到处搜集反对总路线和否定大跃

进、人民公社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彭德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采取资产阶级的阴谋手法，在党内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拉拢私党，进行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纠集了一个以他为头子的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反党集团，组成了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军事俱乐部”。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和八月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前和会议期间，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起了猖狂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把一份经过精心炮制的所谓《意见书》抛了出来。这份《意见书》以及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所散布的言论，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总路线的样子，而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的形势描写得漆黑一团。他们恶毒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谩骂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得不偿失”或具“有失无得”，胡说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污蔑人民公社是“少数人轰起来的”。彭德怀甚至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指手划脚，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到处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冲天革命干劲，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攻击群众运动“妨碍正常秩序”，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

帅，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实际上是妄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取代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他们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竭力推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彭德怀的反党阴谋活动，适应了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统治中国人民。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华反共反革命活动相呼应的。彭德怀里通外国，同赫鲁晓夫秘密勾结。他在庐山会议跳出来后，赫鲁晓夫公然为其撑腰打气，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

彭德怀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他本是一个带着“入股”思想投机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忠实地执行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内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

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压仰晋冀鲁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并把自己负责的华北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自己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对于彭德怀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毛主席曾多次给予教育。但彭德怀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彭德怀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反党活动也更为猖獗。一九五三年，他又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纠集了一伙高饶反党集团残余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一次跳了出来，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煽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不满分子、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这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是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刘少奇资产阶级阶司令部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在背地里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彭德怀一呼一应，心心相印。只是经过了一番较量之后，彭德怀的反党集团被打败了，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见势不妙，才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阴谋。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且在会议期间写了许多重要的批语和指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

另立机会主义的党。一定要在广大干部中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毛主席在痛斥彭德怀之流诬蔑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时，深刻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毛主席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特别是中央的团结，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一切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以外，总是可以改变的。改不过来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毛主席号召全党，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越来越大地发挥它的威力。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不但在去年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在今年继续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显著地发挥它的优越性。”^③针对以彭德怀为头子的反党集团的进攻，全会强调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

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成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全会揭发和清算了彭德怀一伙的反党罪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撤掉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所担任的国防、外交、省委等部门的领导职务。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为了贯彻全会精神，八月七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向各级党组织指出，右倾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第三节 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 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

【粉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中

四、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日益强大。中国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争挑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古巴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斗争也日益发展。所有这些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前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进一步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阵线矛盾重重，正在加速走向四分五裂。

但是，国际斗争的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称霸世界，继续推行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一面玩弄各种和平花招，一面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背叛共产主义事业，愈走愈远。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追随美帝、苏修，疯狂镇压革命人民。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印度反动派，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它们结成反华的“神圣同盟”，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帝、修、反恶毒地诬蔑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且对我国实行封锁、包围、禁运、颠覆和武装侵略。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乘机抛出

了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投靠苏修，联合美帝和各国反动派，扑灭世界革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帝、修、反的反华逆流、对刘少奇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先后会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深刻地论述了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形势和经验，阐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一九六〇年五月，毛主席在同日本、古巴等国朋友谈话时，针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揭露美帝在“和平”的幌子下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庄严地宣布：“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要打倒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必须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正确路线只能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中写道：“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日本人民、也是各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支持西欧、北美和澳洲的工人运动。一九六〇年五月，日本人民掀起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动。同月九日，我国首都一百万群众举行示威，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对古巴人民、南朝鲜人民和印度尼西亚、老挝、刚果、土耳其等国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我国人民都给予坚决的声援和支持。我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一九六〇年六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窜到菲律宾、冲绳、南朝鲜和我国台湾，进行阴谋活动。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的反美斗争，表示伟大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蔑视鄙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奉令在六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前夕和十九日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

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我炮兵部队向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打炮“迎送”美帝头子。美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并支持和唆使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派出武装匪特骚扰我沿海地区。英雄的我国军民，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在华东地区上空首次击落美制蒋帮U—2型飞机一架，沉重地打击了美帝的军事挑衅。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道，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自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他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放肆地进行反对我党和我国的活动。一九五八年，苏修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提出要在我国建立所谓长波电台和搞什么“共同舰队”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党中央和政府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六月，苏修恼羞成怒，片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九月，苏修不顾我国多次提出的不同意见，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以讨好美帝。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中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赫鲁晓夫把投降美帝的叛卖行径，说成是什么“开创”了“国际关系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而加以大肆吹嘘。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党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深刻

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指名地批判了苏修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接着，五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和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我党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反对苏共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同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经过精心准备，竟然对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我党代表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维护各国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且在会上发表了书面声明，指出我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着一系列基本原则上的分歧。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党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我党这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立场和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决支持。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压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去。七月，苏修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为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物资设备，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并且挑起了中苏边界纠纷。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任何敌人所吓不倒，也压不服的。我党和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

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在准备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过程中，我党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首先是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的，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了高潮。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苏修叛徒集团企图强迫各兄弟党接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但是，它的阴谋失败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兄弟党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会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刚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公然推翻他自己签了字的八十一个兄弟党的联合声明，放肆地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纲领，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会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带头大反斯大林，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向大会的致词和同赫鲁晓夫等人会谈中，再一次重申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对苏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会后，苏修叛徒集团又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

议，拒绝了我党一九六二年四月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修还通过它驻我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进入苏联境内。但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共反华活动，尽管猖獗一时，只不过是狗急跳墙，丝毫不表示它的强大。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转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苏修叛徒集团色厉内荏，是一只纸老虎，越是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也就越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它的丑恶本质，从反面教育人民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还击退了印度反动派掀起的几次反华恶浪。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代表着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继承和保持英国殖民者所留下的遗产，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它为了打击国内的进步势力，转移人民的视线，以讨好美帝、苏修，获取更多的美元和卢布，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不断掀起反华运动。一九五九年三月，在印度反动派的策动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达赖喇嘛叛国集团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一忍再忍，申明大义，使西藏人民看清这不是什么汉藏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而是反动农奴主对革命人民的叛乱。十九日，叛乱分子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举行全面进攻。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同西藏爱国僧俗人民一起，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这时，印度反动派一片喧嚷，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自三月十七日至五月四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连续八次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胡说农奴主的叛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恶毒地把平定叛乱污蔑为“武装干涉”，把西藏局势说成是“悲剧”。印度扩张主义者还叫嚷要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他们在印度国会里公开讨论纯属我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在新德里等地举行反对中国的集会，并组织所谓“支援西藏委员会”，要求召开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③，甚至叫嚣要派“志愿军”到西藏等等。他们还公然支持在印度的西藏叛匪头目达赖喇嘛进行叛国活动，纠集逃到印度的叛匪，妄图卷土重来，在西藏复辟农奴主的反动统治。

中国人民对印度反动派的反华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四月二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五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重要文章，揭露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印度扩张主义的深刻根源，打击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动派，揭露了尼赫鲁的真面目，分析了西藏反动分子叛乱事件的实质和印度政府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坚定的立场和政策。印度政府的扩张主义行径被我揭露后，它在全世界的处境空前孤立，反华活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但是，印度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了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印度反动派随即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第二次反华浪潮。尼赫鲁在国会和记者招待会的谈话中，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硬要我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④为中印东段边界线。不仅如此，印度反动派还向中国提出了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全面的领土要求。印度反动派已经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和中段的二千平方

公里的领土，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九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在给尼赫鲁的信中，严正声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九六〇年四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新德里，就边界问题同尼赫鲁举行会谈。但是尼赫鲁却要我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以致谈判没有在任何实质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以后，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多次制造武装冲突，蓄意向我边防部队进行攻击。我军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印度反动派的进攻。

斗争实践证明，帝、修、反的所谓反华“大合唱”，只不过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就全世界来说，帝国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他们的人数极少，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相反，却激起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反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他们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其丑恶面目，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恰恰是帝、修、反他们自己。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发动猖狂进攻，全党和全国人民奋起进行反击的时候，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这一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历史时期的七十篇重要著

作，其中有三十五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发展，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最后决战的光辉记录，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喜事。在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这部光辉著作的出版，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部伟大著作，是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首光辉诗词，赞扬“中华儿女多奇志”，“芙蓉国里尽朝晖”，怒斥帝、修、反“螻蛄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诗篇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革命立场，发扬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革命英雄气概，不怕鬼、不怕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定要胜利。毛主席的诗词，充分体现了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榜样。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在反击帝、修、反猖狂进攻的同时，毛主席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的背叛行

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一九五九年，全国十六亿亩耕地，有六亿亩受灾。一九六〇年，又受到近百年来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有九亿亩耕地受灾，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受重灾，一部分农田甚至颗粒无收。一九六一年，又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和一些其他经济作物继续歉收。农业的歉收，影响到工业生产、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一部分轻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经济困难面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围绕着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的猖狂反华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他们极力夸大暂时的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战胜困难，妄图乘机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全会正确估计了国际斗争的形势，重新强调党在国际斗争中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

的斗争进行到底。

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国的工业生产获得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农业方面，虽然由于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能够完成生产计划，但是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农业技术装备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已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就不仅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按照毛主席在一九六〇年提出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重要指示，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其中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同时，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以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发展变革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内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品种规格。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尖锐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全会指出，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

中，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我们某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已经篡夺了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运动，以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同一小撮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把那些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内的坏分子坚决清洗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对于那些已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要坚决地进行夺权斗争。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一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搞调查研究，都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都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而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主席指出，作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各部队党委，应分别到基层中去，到公社、生产队、工厂、学校、商店、连队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选择一两个或两三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农村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

会以后，全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正当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一伙又改换手法，乘着反右倾斗争的机会，再一次刮起“共产风”，干扰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到一九六〇年春，在农村中的不少地方，形“左”实右的错误又重新抬头了。

这种形“左”实右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实行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平均主义，违反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形“左”实右错误的另一个表现，是无偿地调拨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产品和劳动力，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损害了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利益。此外，在领导工作中还出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命令风。他们违反客观实际的可能，违背广大群众的意愿，盲目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在同一时间内不分轻重缓急地提出许多“大办”。刘少奇一伙妄图用这些办法来破坏工农联盟，瓦解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彻底纠正刘少奇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关键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是：

（一）人民公社中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二）发展公社一级

经济的问题，（三）分配原则的问题，（四）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五）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干部想通和正确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坚决地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和五月十五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和《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农村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严重问题，提起充分的注意。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这些歪风邪气。要分期分批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认真地进行整风整社。党中央在十月十二日还转发了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文件，并且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以正确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正确解决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

党中央为了彻底纠正形“左”实右的错误，进一步引导人民公社胜利向前发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十一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人民公社“十二条”）。信中指出：人民公社在同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必须看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在许多地方还相当严重。因此，中央再次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来破坏这种制度。

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在人民公社中，必须坚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坚持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必须坚持少扣多分的原则，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将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的指示连同这封指示信迅速地同广大社员群众见面，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并且要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十五日，毛主席再次指示全党，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自从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系列指示发布以后，刘少奇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才开始得到了认真、彻底的纠正。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央广州会议上亲自领导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个草案经过在干部和群众中的讨论和试点调查，在同年六月中央北京会议上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即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决定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了下来。《六十条》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它系统地总结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规模、经营管理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六十条》指出：“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

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健康成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斗争】 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对于争取经济情况的好转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首先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和十四日，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央再次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而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革命任务。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坚决压缩水利、公路、航道、土铁路等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搞好田间管理，力争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林牧副渔也要发展。中央的指示还强调指出，保证农业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支援农业。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排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重工轻农”、“以重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国民经济进一步明确地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次序安排计划，认真搞好综合平衡，使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起来，从而促进了我国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我国勤劳勇敢的五亿农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援下，为战胜暂时困难，夺取农业战线的新胜利，进行了伟大的战斗。他们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力争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丰收。在我国的许多平原地区、某些山区和丘陵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充分运用原有的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继续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把各种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农业的稳产、高产。在原来基

础较差或受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实行山、水、田、林综合治理，把不利条件改变成有利条件，提高了农业产量。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战线上涌现了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先进单位。山西省大寨大队就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光辉榜样。大寨座落在层峦迭嶂的太行山中，全大队的土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之上和沟壑之中，土质十分瘠薄，耕畜和农具量少而质劣。但困难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使大寨人民退缩，相反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民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决心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他们身在太行，胸怀全国，眼看世界，充满着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他们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把全村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阡陌垒堰淤成良田，把全村被分割的四千七百多块的八百多亩坡地、圪梁地修成水平梯田。他们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到一九六二年，大寨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七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大寨的光辉事迹，充分显示了党的总路线的无比正确，表现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在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着重加强了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以及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六〇年三月，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制定了《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办好社会主

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六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又指出，我国工业今后的发展，数量不可不讲，但应着重抓规格、品种、质量。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加强工业战线的统一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继续前进。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指出必须把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四项任务结合起来，必须进一步地合理地调整有关计划工作、工业生产、物资供应、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必须千方百计、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各项急迫的问题，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

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光辉思想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创造了惊人的业迹。大庆油田就是工业战线上一个光荣的榜样。大庆油田会战，是在一九六〇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掀起的反华恶浪，迎着刘少奇一伙在工业上刮起的下马风，打上去的。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英雄的大庆工人，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头顶蓝天，脚踩荒原，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讽刺打击，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条条框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国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是我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经过三年的努力奋斗，到了一九六三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经过困难的考验和锻炼，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更为提高，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更为高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总之，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我国遇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和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愈来愈猖狂。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少数反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他们的“出头日子已经到了”，“天就要变了”，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有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他们的手里。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恢复封建宗族统治的活动，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搞罪恶勾当。反动分子甚至开设地下工厂，大搞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套购国家物资，非法获取暴利。有的地方，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此外，秘密串联、盗窃情报、里通外国、杀人放火等反革命活动，多处发生。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及其一伙，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刘少奇公然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说什么：“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

本主义泛滥”。“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⑥他还主张给资本主义发展以合法地位，说“可以考虑允许一批商人出来，开放一批，给他合法化，让他搞。这样危险并不大。”^⑦刘少奇一伙公开地提出并推行所谓“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叫嚷什么“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⑧，还派出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经验”。按照刘少奇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什么“责任田”、“分田到户”、“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纷纷出笼了。刘少奇一伙还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相对抗。他们把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这个重要阵地，歪曲为单纯的“经济组织”、“生产经营单位”，蓄意抹杀工业企业里的阶级斗争，鼓吹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宣扬“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还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对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在文艺领域中，刘少奇积极支持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他们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它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作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维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统治，猖狂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抗。在这条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文艺界的许多协会、团体、机关，被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权

威、反动作家等所霸占，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周扬一伙又抛出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文艺领域中，毒草丛生，牛鬼蛇神纷纷登场表演。仅在一九六一年几个月之间，《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毒草连续出笼。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电影《燎原》，也在这期间炮制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些反动小说、电影、文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野心家、阴谋家歌功颂德，为反党分子鸣冤叫屈，美化叛徒、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煽动地富反坏右进行阶级报复。这个时期，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塞满了封、资、修的东西。

在教育领域中，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竭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一年九月，他们炮制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条例，使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更系统化了。这个条例，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抹杀教育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保护资产阶级，不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它多方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顽固地推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它鼓吹智育第一，书本至上，关门办学，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它削弱甚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权。这个条例下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

加严重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经验，一九六二年一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和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以及大型企业党委等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共计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做了一个黑报告，猖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并且公然为彭德怀之流翻案。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反党谬论，明确地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再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替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这是因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的总路线，进一步健全人民公社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

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刘少奇一伙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实质。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党内并不纯洁，有些大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否则是要吃亏的。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伙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严肃地指出：“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讲话中，着重地论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指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没有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这种集中领导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转引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我们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毛主席教导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解放军报》）毛主席批判那些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的人，是老虎屁股摸不

得，是“西楚霸王”。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难免要“别姬”的，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

实践证明，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有效地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巩固。毛主席强调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坚决地依靠群众。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面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能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转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号召全党同志为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战斗，深刻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是我们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同志，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本章小结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遥相呼应，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全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反复证明了

毛主席所揭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根本原理：“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这场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保卫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接着，刘少奇也不断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对内对外的修正主义路线。

国内外反动派和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的，而只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强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国内外阶级敌人惊慌失措。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全党和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落实了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实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同时，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同帝修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和国际的斗争中，我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注 释】

① “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③ 西姆拉会议，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系英帝国主义所策划。英国在会上提出了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企图把西藏置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统治之下。

④ 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一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英国政府在同西藏秘密换文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既不敢正式公布有关文件，也不敢把“麦克马洪线”划在地图上。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曾经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英国和以后的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所谓“麦克马洪线”根本是非法和无效的。

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同年六月，又在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并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目前，这五项原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⑥ ⑧ 刘少奇：《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⑦ 刘少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